

羅荪文字編集



罗荪文学论集

LUOSUN WENXUE LUNJI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乐秀镛

罗 勃 文 学 论 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77,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10078·3453 定价：1.35元

目 录

文学是我们时代的镜子·····	1
“棍子”何损于鲁迅	
——清算姚文元恶毒诽谤鲁迅的罪行·····	9
文艺·生活·政治·····	19
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批判《纪要》·····	31
“我们需要中篇小说”·····	40
“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	50
今年花胜去年红·····	56
培养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	62
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两条道路斗争·····	69
“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劳工形象·····	92
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	
——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年·····	102
列宁论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113
探索真理的伟大战士——别林斯基	
——纪念别林斯基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125

青年作家的伟大导师——高尔基

——纪念高尔基逝世二十周年 140

创造时代的新英雄人物

——纪念高尔基诞生九十五周年 148

关于《抗战文艺》 157

关于文学批评 179

从“典型公式”谈起 186

生活和政策 194

关于“爱情” 201

评《红日》 206

在伟大历史进程中前进的人们

——评《在和平的日子里》 225

《战斗的青春》评析 241

事业的主人和文学的主人

——试论《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中

的工人阶级形象 256

评《第二次考试》及其批评 278

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287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谈新英雄人物的创造 293

评《未来在召唤》 306

谈《半把剪刀》的两种演出 312

两个杰出的悲剧性格

——《大雷雨》和《团圆之后》观后感 319

坚强的哨兵

——《霓虹灯下的哨兵》小札 323

抗战文艺运动鸟瞰	329
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	351
“民族形式”问题的一场论争	369
文艺批评与鉴赏	389
关于现实主义	
——答史笃先生	402

文学是我们时代的镜子

四月六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以《学会‘照镜子’》为题的思想评论，读后很受启发。一面正常的镜子，总是如实地反映出它所照的对象；但是被照的人却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度。如上文所说，一种是怕见到自己的丑陋，有伤面子，“不敢照”；一种是怕歪曲了自己的尊容，而“不愿照”；还有一种见到照出了自己的丑处，勃然大怒，终于砸烂了镜子；……因人而异，显出了各种不同的照镜子的态度。

要人们“学会照镜子”，正是由于还有一些人不会照镜子，不知道照镜子的道理在于“学会在人们的各种批评、意见中认识自己，学会在认识别人、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世界中认识自己”。李世民对“照镜子”是很有一点体会的，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我们有些写历史的书，就是以“鉴”为名的，如《纲鉴》、《资治通鉴》等等，“鉴”也就是“镜”。读历史也就是“以古为镜”，以历史人物的经验教训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文学也是一面镜子，而且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文学既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它就象一面镜子一样，将我们的时代、社会、生活如实地反映出来。读者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生活，认识世界，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当然读作品也象照镜

子一样,表现出各种不同态度。

列宁写过多篇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其中第一篇文章就是:《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正是把文学看作镜子,而且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看出它是一面反映了俄国革命的镜子。但对这面镜子,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反映。有的人从托尔斯泰的书里看到了“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有人却看到了“勿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而列宁则极其深刻地指出:“俄国无产阶级要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目的不在于使群众局限于诅咒资本和金钱势力,而在于使他们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处处依靠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和社会成就,把自己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军,去推翻资本主义,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新社会。”

这种例子在我们中国也是不少的。例如古典名著《红楼梦》,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一部政治书,有人说是一部爱情书,也有人说是一部诲淫的书,……真是众说纷纭。然而这部伟大的作品,自有它的客观价值,由于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反映了走向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因而它是不朽的。

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关系处于复杂的状况下,更其如此。如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对于一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有的作品在发表的当时,曾受到过读者的欣赏和赞扬,但是一个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降临的时候,对一些作品的评价,竟然走向了反面。例如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

息》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三篇作品，时隔不久，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作者在政治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时间过去了二十年，作者和作品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但是作为一面镜子，确实应当从中认真地汲取一点经验教训。

首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根据抽象的政治概念或者是政治运动的需要呢，还是应当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来作出评价呢？

我们只要认真检查一下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的作品，就能看到，经历了二十年的实践检验，终于证明绝大部分的作品是被批错了或批过头了。这种“批判”颠倒是非，混淆了敌我界限。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使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批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作品。应该说，这是新的时代赋予文学的一项任务。就当时来说，作家还不熟悉如何正确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当文坛上出现这批作品的时候，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因为这些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这种探索是十分可贵的，但是这些作品的生命竟然如此“脆弱”，一场急风暴雨就席卷而去了。

最近，我重读了二十三年前发表的刘宾雁同志的两篇特写和一九五七年有关批判的文章。由于这些批判文章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运动的需要而写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检

验,这些作品和有关的批判文章,对今天来说,都可以作为我们“照镜子”的材料,从中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尽管这些批判文章给作者和作品扣上了各种“帽子”,但也终于有一二句比较“实在”的话,如在一篇批判文章中指责特写的作者是“用一万倍的放大镜来观察我们生活中的臭虫的”。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还存在着“臭虫”。至于作者应不应该用一万倍的放大镜来观察这只“臭虫”,还是应该置之不理,由它去繁殖,继续去吮吸人民的血,危害社会主义,我以为这就涉及到一个作家的职责问题了。

作家应当是一个战士,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战士,绝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当他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的时候,他是怀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满腔热情来观察生活的;他不仅要借助于放大镜、显微镜,还要借助于望远镜,帮助他深入地观察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同志讲过,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进而改造我们的生活,推动我们的时代前进。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它必然还带着旧时代的癥痕,是一个同旧事物不断斗争、促新事物不断成长的时代。五十年代我们还处在补民主革命的课的阶段,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我们正处在两个革命时代的交接点,是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年代。由于我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缺乏民主生活习惯,所以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中,封建主义的东西还相当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在旧社会遗留下的癥痕中,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就是时至今日,封建买卖婚姻仍

然在我们的城乡存在着。越剧《祥林嫂》演出之所以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不少观众仍然要带着手绢到剧场去为祥林嫂洒一掬同情的热泪，绝非偶然。电影《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把芙蓉镇当做世外桃源，但是他终于被那股咄咄逼人的封建势力赶了出来。这些作品到今天还有它的生命力，正是说明了“五四”反封建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仍然是我们的一项战斗任务。

比如反官僚主义，也是我们反封建任务之一。这是由于在我们国家出现的官僚主义，更多的是属于封建性质的。“令出法随”，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一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就是封建官僚主义的特征。

当时把批评官僚主义的作品打成毒草，这就意味着不准批评，实际是把它保护下来，使之继续滋长，危害社会主义。

列宁曾把毒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莠草”当作社会主义三种主要危险之一，因为它是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腐蚀剂，是瓦解社会主义的毒药。

一个忠诚于党、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作家，对于一切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官僚主义莠草”，是绝不能保持缄默、袖手旁观的。如果说这就是“干预生活”，一个正直的作家理所当然的要承担起“干预”的责任，用文学的武器进行战斗，而绝不能坐视这种现象的存在，更不能听任官僚主义势力潜伏下来，使之继续繁衍。作家的批判正是为了铲除它，使广大读者看到这种危害社会主义的现象，能够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才是作家批判官僚主义的目的。

刘宾雁同志的特写，写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作者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官僚主义已开始在腐蚀着我

们新社会的肌体，正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所以用他的笔，进行了战斗。这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强烈的爱和憎。

作者在《在桥梁工地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罗立正，一个在一九四九年大军南下时担任过桥梁检修工程的战士，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随着职位的升迁，官僚主义的习气在身上滋长起来了。在他脑子里有几条戒律，一是只承认上边的指示和决定，不问群众的意见；二是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我们还要做什么呢”！不论出什么天大的事，只要向上级请示过了，责任没有了，就不会犯错误。还有一条戒律，凡是喜欢找领导的毛病，就是反党情绪，他自己是一切听从上边的，自己不拿主意，因此他要求自己的下级，也是能一切听从上边的决定的人，他认为这才是“好干部”。而技术室主任周维本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从来自己不拿主意，讲的都是上级或别人讲过的话，他从来没有任何责任，这是罗立正最信任的人。另一个人物是同群众在一起的实干家工程师曾刚。尽管其它各个队不能完成任务而他所领导的工地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管理得有条有理，但是他在罗立正的眼里却是一个冒险主义者，是有反党情绪的人，因为曾刚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罗立正要把定额压低，为了容易超额，曾刚却提出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要求开展双倍定额运动。这就被认为是冒险，被指责为无纪律，是反党行为，终于被罗立正和他的追随者给排挤出去。

罗立正还只是刚刚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者，但对桥梁工地已经造成了危害，而更严重的是他所欢喜的唯唯诺诺、从来用不着自己操心的大小官僚主义者正在滋长。二十年过去

了，当年的罗立正是否还在我们建设四化的工地上呢？他是已经改变了呢，还是变本加厉地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绊脚石呢？倒是应当照照镜子。

在《本报内部消息》中，也有一个周维本类型的人物，这就是总编室主任。他有一个原则：“把上级指示变成自己的指示，把下级的汇报变成自己的汇报。”这是他工作的秘诀。他还找到了一个窍门，“事事请示”，准没错。但是他还是转变了，他在黄佳英的带动下，终于认识到“一个人要有自己的意见，是多快乐的事”。而特写塑造的一个热情、能干、敢于独立思考、有自己观点的青年记者，却被批判家说成是反党分子。

确实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对作者笔下写出的这些人物，读者会懂得爱谁、恨谁的。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当年的罗立正、陈立栋以及周维本一类的承上启下当惯“收发室”的干部？他们经历了二十三年，受到了“不准批评”的保护，不知道这些干部又在什么位置上安排下来了，他们在这面镜子里又看到了什么，汲取了一些什么教训呢？

当然我们还是高兴地看到了马文元的变化，因为他终于痛心地感到，看着国家吃亏他不着急，看见人民吃苦他不心疼，这种人算什么共产党员？但是如果这种人不转变，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难道仍让他们照旧混下去么？

作家、艺术家的责任，是勇敢地正视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现实生活中复杂尖锐的矛盾；既要善于发现和颂扬如曾刚、黄佳英这样的新人物，又要狠狠地鞭挞那些对国家不负责任、只

顾自己“不犯错误”、专保乌纱帽的蛀虫。我们要把那些阻碍社会前进、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放到广大读者面前示众。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成为伟大时代的镜子，正确而真实地反映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面貌，鼓舞人们去改造世界。

一九七九年四月

“棍子”何损于鲁迅

——清算姚文元恶毒诽谤鲁迅的罪行

鲁迅曾经愤慨地说过：“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翻开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几乎所有的“著名”野心家、阴谋家和修正主义者，无不竞相利用革命伟人的名字为自己做广告，用以掩盖他们的丑恶面目，推行自己的反动政治主张。正如列宁所说的：“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生前和死后，也遇到过不少这样的骗子。

“四人帮”里的一个老反革命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就奉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围攻鲁迅，同时，却又借着鲁迅的名字为自己做广告。

反动文痞姚文元算是一个“后起之秀”，他追随着自己的前辈，抛出了一本《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的书（以下简称《巨人》），借以跻入“研究鲁迅”的行列。从此扶摇直上，一时竟成了“鲁迅研究”的“垄断者”、“权威”和舆论工具的“总管”。

现在让我们重新打开《巨人》一书，原来这个所谓“马列主

义理论家”、曾经显赫不可一世的、为江青封为“金棍子”的姚文元，不但也是一个借鲁迅之名做广告的投机商，而且还是一条妄图蛀蚀鲁迅光辉形象的可恶蛀虫。

对于鲁迅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历来是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进行污蔑、歪曲和诽谤的中心。一向自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言人”的姚文元，在这个问题上恰恰表现得十分突出，因而很有必要给予揭露和批判。

少年的鲁迅正处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年代，清政府的腐败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了当时中国社会“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而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从而规定了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鲁迅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成长的。

当时中国的“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鲁迅也正是在这时，要冲出黑暗的牢笼，“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正是鲁迅开始“寻找革命真理”的一个起点。但是姚文元却胡说什么，那时“鲁迅还不知道”什么是“新的东西”，也找不到“生活的道路”等等，这是为他进一步诽谤鲁迅安下的钉子。

鲁迅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要寻求“异路”，是为了救中国，他到日本去学医，是为了救中国，他后来改为从事文艺运动，仍然是为了救中国。这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

鲁迅正是当时这样的“先进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为了寻找救中国的真理，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但是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对他的早期思想影响最深的却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姚文元却用心险恶地在尼采问题上大作文章，把“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污蔑为尼采反动哲学的介绍者、追随者。一而再地把尼采哲学的反动垃圾倒在鲁迅头上。

尼采（一八四四——一九〇〇年）是德国反动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反理性论者，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他的主要学说是“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学说”。他认为“权力意志”是世界的最高原则，“超人”是人类达到最高的境界。他认为“万物永远还原”，历史不是前进的而是倒退的。他鼓吹反动的“人种论”，认为人永远走“自己祖先的路”。他极端蔑视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是“奴隶、畜群”，永远应当为上等人去牺牲、去死亡。因此，尼采哲学乃是一种最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哲学。

早期的鲁迅虽然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当时的思想在本质上同这种极端反动的尼采哲学毫无共同之点，而姚文元却象苍蝇逐臭那样死死盯住了鲁迅早期的某些篇章中的几个“尼采”，大肆渲染、歪曲，并且采用阉割的卑劣手法，非要把鲁迅打成一个尼采主义者不可。

什么鲁迅是“把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当作二十世纪一种最新的思潮”呀！

什么“这种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倾向，使他不能分辨出尼采哲学本质上的反动性”呀！

事实真是这样吗？不！